

## 论抗战小说在当代的转向

吴 辰<sup>1</sup>, 房福贤<sup>2</sup>

(1.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2.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摘 要:**抗战小说对于中国的文学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承载了“抗战”这一对于中华民族有着重要意义的题材,还以文学的形式传承着革命前辈们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宝贵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语境的不同,抗战小说也在每个时代以其不同的面貌出现。抗战小说的历次转向充分说明了抗战精神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的,它正不断地与每个时代结合,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拓展着抗战精神的深度和广度,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资源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精神力量。

**关键词:**抗战小说;抗战精神;叙事;民族主义;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5)05-0021-08

抗战文学是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决战中诞生的,但它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战后 70 年,表现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之间斗争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一直层出不穷,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创作现象。这是因为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抗日战争已经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也就是抗战精神。“抗战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二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三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四是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sup>[1]</sup>。这种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进取前行。文学,无法遗忘这场战争。但是,对战争的叙述,却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诚如韦勒克所说:“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它以语言这一社会创造物作为自己的媒介。”<sup>[2]</sup>战后 70 年的中国抗战小说,便在战后的时代变化与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经历了不同的审美转向:一是由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与战争共时的鼓动宣传向工农大众史诗的转变,这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文学的建设时期;二是突破极“左”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束缚,拓展思想的深度和题材的广度,这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三是走出叙述策略的神话,回归历史的主体性地位,这主要发生在新世纪以后。

收稿日期:2015-04-19

作者简介:吴 辰(1988-),男,河南郑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 —

抗战小说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次转向,呈现出由“功利主义”到“历史主义”过渡的特点。战时的抗战小说与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进程同步,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配合抗日战争的宣传,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特征。这是自然的,因为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受到经济基础及其变迁的制约,它不仅有“美学的”标准,更有着“历史的”标准<sup>[3]</sup>。抗日战争广泛而深刻地改写了中国自新文学诞生以来所形成的一系列文学传统和审美趣味,诚如时为“文协”领导人的老舍所说:“新文艺的产生,根本是一种举国响应的运动。有此运动,故有此文艺。但文艺不能永远停止在某时某地,‘女大十八变’,文艺亦然,它须生长,它须变动。于是五四而后,有种种运动:此种种运动都是外循社会所需,内求文艺本身之进益,故新文艺不死。此种精神,遇到了抗战,便极自然的,合理的,发展为抗战文艺运动。”<sup>[4]</sup>抗战时期的时代话语和血淋淋的现实逼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各个角落的人们从自己的世界中走出,不得不将战争这一非常态化的事件纳入原本相对正常的生活轨道。当时的文艺工作者们普遍认为“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既忠实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笨拙的想法实在还不容易,除非他把真实丢开……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sup>[5]</sup>。在这种社会历史语境下,文学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审美、娱乐、启蒙,“抗战使中国的新文学变了质,像脱下华服的青年踏上了征程,文学在中国就成为了‘反侵略’的一种武器而存在着”<sup>[6]</sup>。战火中产生的抗战小说,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激励和鼓舞中华民族顽强抗战,而且,这种带有强烈功利性的文学也的确为最终获得抗战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文学的本质毕竟是审美的,当战争结束之后,现实已经不再迫切地需要作家以笔为枪的时候,抗战文学的转向也就自然地发生了。

战后中国抗战文学的第一次转向,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其时,服务于战争的现实要求已经渐渐远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目标迅速浮出地表,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一切创作的基本原则,抗战小说自然也与其他题材的创作一起被整合进“人民文艺”或“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的序列中,并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由于不再直接服务于现实的战争,其作为革命史诗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特性便被突出与强化出来,因之其时的抗战小说与战时小说便有所不同,表现出了比较浓厚的“革命历史主义”色彩。作家在创作作品的同时,自觉地承担起了共和国史官的职责。他们认为“历来的史官、史家都是写皇家的历史、公侯将相的历史、资产阶级的历史。很少有人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工人阶级的历史的。推动历史前进的人,在历史上却没有他们的地位……劳动人民的力量、聪明、才智无法在史书上充分表达出来”<sup>[7]</sup>。在这种创作观念的统御下,抗战小说的创作动机和写作所依托的思想资源都较为单一,叙事视角基本上以工农兵大众为主,以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英勇抗击日寇和人民群众对党和军队的支持为主要目标,革命史诗的内在要求也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多以长篇为主,作品结构大多以英雄传奇模式展开。《铁道游击队》的作者知侠在讲述其创作心路时曾经说道:“本来按我个人的经历,写这样长的文学作品,是力不胜任的。所以有勇气写下去,主要是铁道游击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斗争事迹鼓舞了我。我敬爱他们,熟悉他们,我有着要表现他们的热切愿望。加上他们给予我的光荣的委托,我觉得不完成这一任务,就对不起他们和他们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牺牲了的战友。同时,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熟悉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的英雄斗争事迹,也有责任把它写出来,献给人民。”<sup>[8]</sup>《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平原烈火》、《敌后武工队》、《大刀记》等一批优秀的红色经典以革命英雄传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其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人物经历的曲折离奇吸引着大批读者。

受革命历史主义影响,此一时期的抗战文学普遍被一种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所感染,往往将抗战的过程形式化,将抗战的双方脸谱化。《平原烈火》、《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盐民游击队》、《战斗的青春》、《战斗在滹沱河上》等等,不仅题目相似,而且故事也差不多:一系列紧张激

烈的战事,都是以我方胜利、敌方失败结束。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普遍具有脸谱化特征:我方的人物形象,虽是穷苦人家出身,却生得眉清目秀,十分英俊,为人精明强悍,勇敢果决;而日本军人的形象则多是长相丑陋、外貌愚笨;至于小说中的汉奸形象,更是不堪,不仅外貌龌龊猥琐,人品道德也十分低下。汉奸赵青和他父亲的小老婆勾搭成奸,而赵青的父亲自打儿媳过门,“就存心扒灰”(《战斗的青春》);张老东虽然表面上一本正经,但却长期霸占兄弟媳妇,“儿媳守寡后,他又丢了兄弟媳妇,逼着跟儿媳睡了觉”(《战斗在滹沱河上》);何大拿则与他的干妹子通奸(《烈火金刚》)。不但如此,按照革命现实主义的书写逻辑,其亲属子嗣的形象也是被极度丑化了的,甚至连名字也传达出了作者对他们的嘲弄和不屑。

革命历史叙述上的乐观主义倾向使得这一时期的抗战小说作品总是以大团圆结局告终,而文本对敌人的书写往往将之丑化、愚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严肃性。加之建国以来文学作品的内在写作逻辑都是建立在一种阶级论基础之上的,造成了抗战小说的书写疆域无法很好地展开,国民党军队以及一些非工农阶级英勇抗战的情景不能进入文学创作的范围,抗战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局限于敌后解放区的抗战,这就使得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抗战小说无法在多领域展开写作实践,从而大大限制了抗战小说发展的可能性。另外,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将一切都赋予了阶级的色彩,这就注定了对于抗战的叙述只能采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虽然波澜壮阔的战争叙述和革命英雄们奋不顾身的英勇杀敌无疑会给读者带来心灵上的冲击和净化,但因视角的限制和叙述方式的单一,制约了抗战小说的发展与推进。由于从属于工农兵大众史诗的体系之中,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了人性和艺术性在文本中的表现,抗战小说主体性并不明显,“抗战”在很多时候只是一个背景性的素材,真正的内核还是在于对党和劳动人民力量的歌颂。

## 二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逐渐宽松,此时,作为社会最敏感神经的中国文学,最早感受到了即将来临的思想解放的春天的气息,当代文学为了打破禁区,开始跃跃欲试。但是,突破口在哪里?现实生活当然最有力,因为它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最为密切,但也是阻力最大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时代路口上,抗战文学成了最合适的叙述突破口。既是民族的、又是革命的这种特殊性,使抗战历史成为一种有着多种言说可能的叙事。表现在抗战小说领域,则是一个个曾经的禁区被开拓、各种叙事手段与曾经一统天下的现实主义并驾齐驱,抗战小说的书写在思想的深度上不断地被扩展。抗战文学终于有意识地开始文学自身的回归之旅。

方之的《内奸》不是一篇典型的抗战小说,它对田玉堂在40年中的遭遇并没有超出所谓“反思文学”的范畴,但作品对于抗战过程中种种含混事件的书写,使曾经延续了数十年的齐声歌唱出现了杂音。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对抗战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解方式与叙述方式几乎是一致的,无论是人物还是进程都是简单而明确的,但《内奸》却打破了传统的观念,对历史事件进行了新的阐释,特别是田玉堂这个为人圆滑但又不乏爱国之心的人物,让读者们开始意识到抗战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也正是这种有突破性的历史叙述,鼓舞了一批有志于抗战文学创作的新老作家开始探索在个人维度上进行的新的书写。以《红高粱家族》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将抗战英雄还原成为一个个血气方刚而又有着明显性格缺陷的普通人,将宏大磅礴的史诗还原到一个个具体个人的爱恨情仇,国仇家恨交织在一起,一个民族的抗战和无数个人对于命运的抗争合而为一,难分彼此。老作家周而复也在积极地拓展着抗战叙事的新空间,在六卷本的《长城万里图》中,那些出现在庄严的史书中的名字被作家请出了历史,蒋介石、宋美龄、周佛海等几乎被定型化了的历史风云人物开始有了人的气息,作者并不急于用某些流行的概念为活跃于抗日战争这个大舞台上的人物打上一个政治标签,而是尝试以一个个具体人物的生活场景来全景式地再现抗日战场的每一个角落。作者的镜头不断地游走于宏大战场与琐屑生活之间,

并着力刻画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生动地展示出了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在面对国难时复杂而细碎的心态。《长城万里图》以其细致的笔触超越了长久以来由“左”的思想衍生出的善与恶、是与非的对垒,将事关民族生死的战争和个人内心的冲突与博弈合而为一,深刻地表现出了战争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影响。

这一阶段的抗战小说在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深度的同时,其书写疆域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描写是不被允许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政治文化环境的日益宽松,更多的史实被披露,国统区的抗战也成为了抗战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热点。而对抗日战场的认识也进一步地被扩宽,不再仅仅局限于荷枪实弹的战争景象,老作家宗璞陆续出版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sup>①</sup>生动地还原了在抗战时期,身处国统区的西南联大师生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努力与日寇斗争的全过程。作者以一名儿童——小娃的成长经历贯穿全篇,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抗战的严酷环境对其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影响。《南渡记》中,作者对吕清非一家离开北京之前的几天所发生的事件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小小的吕家院落融进了对于民族、家国与个人命运的严肃命题,在写到吕老人因不愿受日本侵略者出任伪职的逼迫而含恨自杀的时候,作者甚至不惜跳出来,借用吕老人的“棺中人语”道出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战争与生存、名誉与生命的冷峻思考,“因为自己的存在已成为累赘,只有否定,才得干净。现在我用我的手做到了,得到这片黑暗,这片永恒的遮盖一切的黑暗,什么也不用再扮演……这否定是我常关心的。但是没有机会,没有一个由头。如今我利用这一着,不只否定了我的生,也否定了利用我存在的企图。何幸如此!此之谓死有轻重之别了……我常慨叹奔走一生,于国无补;常遗憾宝剑悬壁,徒吼西风。不想一生最后一着,稍杀敌人气焰!躺在这里,不免有些得意……能做到无愧于一个中国人么?我们的胜利,需要多少年?多少年?……我好恨!我还没有顶天立地做过人,总在耻辱中过日子。如今被赶到这窄小的匣中,居然还会得意!……时间不会停顿,而我是再也起不来了。只好冷笑,连嘴角也弯不动了”<sup>②</sup>。在吕老人即将离世的时候,其对于命运、国家和民族的思索是深刻的,而作为知识分子,在战争的语境下生存的无奈和环境的逼迫又将问题引向了在战争年代“诗人何为”的问题上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抗战小说的书写中,一种对于上个时代的反叛姿态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中国的作家们开始意识到历史并不是曾经教科书中的铁板一块,它具有丰富的多面性。此时的作家们执著地向着官方修订的“正史”高声喊出“我不相信”,他们在文学作品中消解着史诗的光辉,将那些曾经需要仰望的英雄形象从神坛上拉了下来,并将他们重新塑造成一个个庄严与戏谑、高大与猥琐、英勇与怯懦兼而有之的普通人。抗日的战场正如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美丽最齷齪、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sup>③</sup>。这些新叙事手法的运用和生活化、去历史化的书写背后,隐含着对于上一个时代文学审美范式的反叛。这种反叛消解着一切崇高,甚至有的时候是以一种嘲弄的态度去书写历史。先锋作家洪峰在《瀚海》中描述白雪雪的爸爸在日本人的大后方与日军作战,“他们的确打鬼子。洮南府的鬼子县长就是他亲手砍的”,但白雪雪的爸爸与日本人结仇的原因却消解了这一抗战行为的庄严感:“他打小日本也杀老百姓还霸占良家妇女……在洮南府睡了一个日本女人……日本县长知道了这件事,就把他们抓了”。在新时期的先锋作家们的眼中,生活是残酷的、是“没有诗意的”<sup>④</sup>。这种创作理念本身无可厚非,但在创作抗战小说时也持着同样的观点,就容易在“躲避崇高”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抗战的精神以及其对于中华民族的深远意义消解掉了,将充满了悲壮色彩的抗战历史变成了任人调侃的饭后闲谈。这一点对于抗战精神在现今社会中的发扬是极为不利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成为了当下“抗日神剧”等消费、娱乐抗战精神的滥觞,对后人正确认识和理解抗战历史有着较大的阻碍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小说中抗战题材的思想深度、视角宽度和内容广度都有很大程度的扩充,其

<sup>①</sup>目前已出版前三卷《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

中经由抗战而对人物内心进行的深入而细致的刻画使抗战小说超越了历史主义的限制,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随着当代文化语境的变迁,曾经大量出现的专门描写抗战历史的文学作品有所减少,但有关抗战历史的反思与描写并未停止,通过20世纪末大量出现的家族小说,抗战以另外一种方式再次进入了文学的视野。莫言的《丰乳肥臀》、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等长篇小说都不约而同地将抗战置入一个家族或一个地区精神的变迁之中,以更开阔的视野发现历史事件对历代中国人精神塑造的痕迹,并对之进行深刻的反思。在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中,日军占据北平期间所发生的家长里短,草蛇灰线般地延伸进了倪吾成和倪藻父子二人的生命当中,成为了他们精神上永恒的伤痕。在这类小说中,抗战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成为了中华民族20世纪精神变迁史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一直延续到当下人们的生活当中,影响着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处境。而这也正是抗战小说的重要意义之一:历史走到了新时期,面对侵略和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一味的乐观、消极的回避或者愤怒的仇恨都是不可取的。新时期以来,作家们开始注意到抗战对于中国人精神生态的影响,开始直面苦痛,深入探讨苦难的意义,将刻骨铭心的苦难化作中华民族不断反思、生生不息的动力。

抗战小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转向,使一度遮蔽了的历史渐渐从“革命历史”的脉络中走出,抗战期间一些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史实得到披露和重视,抗战精神不再专属于工农兵大众,而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甚至是属于那些包括一些日本人在内的在抗战期间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作过贡献的外籍人士。抗战小说开始积极地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进行对话与交流,从一切世界优秀的反法西斯文学那里吸取资源,不断丰富、完善着自己,并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应当说是抗战小说二次转向后的最重要的收获。

### 三

进入新世纪以后,抗战小说似乎有些沉寂,但仔细观察,平静的背后,其实正在或已经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向人性不断深入探索的同时,抗战文学正在不断地从历史中汲取力量。这种变化正是一种新的转向的开始。有来自军队的文学工作者认为,军旅文学的衡量标准自下而上可以依次排列为“功利主义”、“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sup>[2]</sup>,而新世纪以来的抗战小说将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新世纪以来抗战文学的一个很大变化,就是一批英雄形象得到了重新的阐释和塑造,而对于英雄事迹的描述也渐渐地从新时期以来的种种叙事策略中走出,更加尊重历史的本真,有了一种“非虚构”的意味。同时,随着对于各种文学理论的咀嚼与消化,历史以其强大的力量再一次从虚构的幻影中突围,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资源。这一次,作家们的主要创作资源来自于那些处于原始状态的史料,他们通过对形式不一的史料的发掘,重新严肃地勾勒出历史的样貌。作家们开始发掘一些个人化的历史,包括一些当年的日记、书信以及年已老迈的英雄们的口述回忆。通过对于这些珍贵资源的发掘和整理,抗战小说开始向着一个“非虚构”的领域发展。张百如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献礼的作品的《哀兵》就以“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纪实”作为其副标题。作者通过对这段史实的深入了解,迫切于言而写下了这部小说。这本身就带给读者以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小说大量列举了诸如部队建制、人物书信等史实资料,并利用具体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和叙述来丰满着这一段历史,努力在历史的混杂中找寻着民族存亡与个人命运之间相互交叉的地方。通过作者不辞艰辛的一手调查,一些抗日战争中鲜为人知的事实再次浮出了历史的地表,并和主人公的命运沉浮一起构成了这部小说中最为令人感动的部分。与《红高粱家族》等小说不同,《哀兵》代表的这一类具有“非虚构”色彩的抗战小说不再以自曝家丑式地揭露家族的一些轶闻为乐,而是多了一分对历史和英雄的尊敬。作者无意将主人公变成一个个完全欲望化了的人物形象,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和无聊的争风吃醋中消解着他们作为英雄的意义。以《哀兵》为代表的这类小说,曾经的英雄还是英雄,只不过曾经在革命话语掩盖

下的单向度、单色调的英雄在史实的佐证下变得更加立体、更加丰富。张百如的《哀兵》只是一个开端,新世纪以来,大量的以“非虚构”形式出现的抗战小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里。《父亲的战场》的作者章东磐重新踏上其父亲在中国远征军的时候走过的路,在每一处当代文明的背后追寻父亲和战友们曾经战斗过的痕迹,在一些经历过抗战的老人那里,作者努力地用文字建立起抗战精神与当下的联系,当问及发生在多年前的战争的时候,战争的经历者只说到:“反攻的时候,从高黎贡山淌下来的不是水,都是旺子。”<sup>[13]</sup>①阅至此处,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对当时参与抗战的英雄们充满了敬意。

终于,抗战小说在新世纪前后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地位。在新时期尚显得有些先锋和反叛味道的对全民族抗战(尤其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书写已经慢慢地变成了一种常识;同时,随着更多的史实在小说中的呈现,抗战在文学领域的地图渐渐地趋于立体、趋于丰满,并且有一种历史的力量贯穿其间,使之成为一座座英烈们不可撼动的丰碑。兰晓龙写于2009年的小说《我的团长我的团》讲的是一些被日本人打得毫无斗志的国民党士兵在团长龙文章的策动下重新燃起斗志,决定加入中国远征军,以必死的决心与日寇进行斗争的故事。小说对抗战末期西南边城寥落的风景和遭遇豫湘桂战役惨败后的国民党将士的精神状态的描写贴切而细致,足见作者在收集史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小说主人公团长龙文章虽然是中国军人精神的集合体,但是由于在其身上所发生事件的翔实,居然使得许多读者试图在历史中寻找其原型。一个虚构的人物竟有着如此的魅力,新世纪抗战小说中由历史而来的巨大感染力可见一斑。同一年稍晚出版的方知今的小说《中国远征军》的副标题就是《纪实版〈我的团长我的团〉》,与兰晓龙虚构的龙文章不同,方知今的小说更多地像是一部整合后的口述历史,小说自称是以一种“压迫式”的采访方式来记录“远征军将士及将士子女”,以“全面披露真实的中国远征军”<sup>[14]</sup>。作者方知今本人即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后裔,其父亲方靖曾经带领着中国远征军在中南半岛的丛林中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过殊死的斗争,作者在创作时不但通过对于远征军将士或其亲属的采访获得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而这段与自己家族息息相关的历史,更是让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充满了一种责任感和对历史的尊重。小说在对一手采访资料的整理和对史实资料的分析中甚至带有一种学术研究的味道;小说将人物的行动还原到历史的场景,也使得人物形象较之前的抗战小说更加丰满,他们英勇悲壮的事迹也更深入人心。小说在历史史实中展现出人性的丰富与顽强,给予读者的心灵以双倍的震撼。新世纪以来,这样基于史实和调查而写作的抗战小说越来越多,抗战精神也在史实的支撑下变得越来越深入人心,它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不断地激励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抗战小说在新世纪还明显呈现出了大众化的特征。这一时期的许多抗战小说都倾向于跨越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在注重思想性和严肃性的同时,也更加口语化和通俗化。抗战小说的作者不再刻意地使用含混复杂的叙述技巧,也告别了华丽艰涩的词汇,而是更多地选择了一种贴近生活的语言,将阅读的大门向更多的读者敞开,而这也正是抗战小说所具有的独特品质:它向各个程度的读者敞开,向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传达着支撑中华民族奋斗不息的抗战精神。新世纪以来的抗战小说还习惯与大众媒体相结合,兰晓龙的《我的团长我的团》、麦家的《风声》等一批优秀的抗战小说纷纷被搬上银幕,以电影和电视剧的形式与更多的读者和观众接触,让抗战精神在更广泛的群众中传播。同时,抗战小说与代表着商业和消费的大众传媒相结合,也说明了即使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经由抗战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也并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消亡。它正在与每个时代积极地对话,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发挥着它重要的作用。但是,抗战小说与大众传媒相结合也产生了一些问题。近年来,一些抗战小说和电影、电视剧过分地将抗战题材消费化和娱乐化。在一些作品中,甚至将抗战与穿越、奇幻等题材结合起来,这种对抗战史实的过分扭曲和虚构并不能对抗战精神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在那些不着边际的幻想中,抗战精神也被消解了,成为了失去严肃性的市井杂谈,这

①“旺子”即血。

是值得我们每个人警惕的现象。

#### 四

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回顾建国以来中国的抗战小说,不难发现,抗战小说无论是叙事还是题材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对抗战史料的不断发掘和对抗战精神的深入理解,还会有更多的不同形式、不同视角的优秀抗战小说作品出现。优秀的抗战小说不应该满足于民族主义情绪的抒发,在一篇优秀的抗战小说中,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应该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内在支撑。包括中国抗战小说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并不仅仅是意在描写某一场特定的战役或战争的场景,其主旨是在于以史为鉴,避免法西斯主义的重新抬头和反思战争对人和人和社会带来的伤害。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在于深植于人心中的贪欲和恶念,反法西斯文学仅仅对战争进行客观的描写是不够的;那些对战争过于通俗化、乐观化的讲述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有着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但是作家对抗战题材的挖掘不能仅仅停留于此。既然法西斯主义的源头来自人类内心的阴暗面,那么包括抗战小说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就需要正视这些阴暗面的存在,并在文学作品中尝试对这些阴暗面种种的突围方式。要做到这点,最重要的就是作家要不断地深化对战争这一题材的认识,扩展这一题材的深度和广度。抗战小说在当代的转向也向读者们证明了这一文学类型的勃勃生机,那种顽强、悲壮、乐观、团结、生生不息的抗战精神对每一个时代而言都是宝贵的,而抗战小说在当代的每一次转向正是这种精神与时代语境的结合。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抗战小说的蓬勃发展不是为了激化中日民族矛盾,而是为了将这种抗战精神传承下去,并时刻提醒那些蠢蠢欲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们不要轻举妄动。尤其是在近期,日本政府再三以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历史教科书来释放军国主义抬头的信号,这对于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容忍的。日本的举动也提醒我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世界的某些角落还没有完全的消亡,抗战小说和抗战精神也并未过时,它将与每一个时代相结合,并延伸进人们的生活当中,关于抗战的叙述也从对一段历史的描述转向了对一种精神的记录。经由抗战小说,人们更加意识到中华民族精神的顽强和伟大,也更加意识到当下的和平是来之不易的。自然,由于抗战小说题材自身的特点,与形形色色的情感故事相比,也许显得过于沉重和坚硬,但是由于题材的特殊性,一些在其他题材文学中通用的文学评价体系不完全适用于抗战小说,对于抗战小说,衡量其价值的标准不应当仅仅来自于审美层面,更应将其社会影响与对抗战精神的发扬考虑在内<sup>[5]</sup>。而抗战小说在当代中国的每一次转向都表现出了掷地有声的英雄气概,抗战精神也将随着抗战小说的不断发展与每一个时代相结合,成为中国人的取之不竭的精神遗产,提醒人们勿忘历史,珍惜和平。

#### 参考文献:

- [1]李振银,张洪兴.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N].人民日报,2014-09-25(07).
- [2]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00.
- [3]恩格斯.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347.
- [4]老舍.哀莫大于心死[J].文风,1942,1(2):2.
- [5]罗赫.“与抗战无关”[N].大公报,1938-12-05.
- [6]狄道.对于小说作家的要求[J].弹花,1938,2(2):34.
- [7]笑雨.用自己的手,写自己的历史[J].文艺报,1958(13).
- [8]知侠.后记[M]//知侠.铁道游击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608.
- [9]宗璞.南渡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08-209.

- [10]莫 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  
[11]洪 峰.瀚海[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  
[12]朱向前.中国军旅文学50年[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8.  
[13]章东磐.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184.  
[14]方知今.中国远征军[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  
[15]房福贤.论新时期抗战小说的命运主题[M]//中国抗战小说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71.

## The Steering of the Present Anti-Japanese War Fiction

Wu Chen<sup>1</sup>, Fang Fuxian<sup>2</sup>

(1.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2.School of Liberal Arts,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1158, China)

**Abstract:**The Anti-Japanese War fiction show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t does not only carry the theme of Anti-Japanese which is very meaningful to the nation of China, but also inheritances the precious spirit of the martyrs through a way of literature. As the time goes by, Anti-Japanese War fiction shows different faces in the different ages. The steer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fiction shows the strong vitality of the spirit of Anti-Japanese, it is keeping on linking every age, extending its depth and breadth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 and become the important spirit power of Chinese nation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Key words:** the Anti-Japanese War fiction; the spirit of Anti-Japanese War; narrative; the territory of writing; humanitarian; nationalism

(责任编辑 王 作)

---

## 本 刊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以及其他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